



叶廷芳

近几年,老朋友一个个去世。大都是“80后”,有的比我大几岁,有的比我小几岁。最近走的,是叶廷芳——2021年9月27日下午6时,老叶溘然仙逝。他生于1936年12月,我生于1938年7月,长我一岁半。这位老哥的走,再加上去年邵燕祥的走,使我蓦然产生某种孤独感——再也不会老友之间十分惬意的诗文唱和了。

叶廷芳是我最敬重的朋友之一。而且我们两人都认为是彼此可交的朋友。有人问他:“您最看重朋友的什么品质?您喜欢与怎样的人交朋友?”他说:“诚实和守信。只要有这两条,我都愿意与之交往,不管地位和身份,也不管贫富和文化水平。与我年轻时的求偶信条一样。”此话深得我心。

但是,我和老叶并非“亲密无间”——因为年轻时不在一个研究所,研究的领域差别大,上班时各进各的室,下班时各走各的路;退休后,住得远,老胳膊老腿儿走动不便,偶尔相见总是在医院候诊的时候——猛抬头:“这不是老叶吗?”“这不是老杜吗”,于是热情寒暄,相约“聚一聚”,但多年来只落实过一次。

我们都是1964年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我去文学研究所当美学研究生,他去外国文学研究所当《世界文学》编辑,业务“不搭界”,相当一段时间,连名字也互不相知。“文革”期间各所之间有了某些“运动”中的交往,知道外文所有会唱歌的“独臂大侠”叶廷芳,但见面只是打个招呼而已。真正认识并交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一天在学部大院,他忽然叫住我:“杜书瀛,你那篇评《创业》的文章,太解气了。好!”他说的是我和杨志杰、朱兵写的《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批判四人帮,赞扬周总理。先是发表在1976年11月5日《解放军报》,受到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表扬,随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加按语转载。

那天,我俩第一次交谈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但是,很少打电话。

2000年4月的一天,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老杜,知道你研究李渔。现在北京人艺正演《风月无边》,是关于李渔的,我给你要了两张票,请你去看。”老叶除了研究和翻译卡夫卡之外,还研究和翻译迪伦马特的戏剧,并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为保留剧目上演,因此与人艺的艺术家们很熟,经常有戏票。老叶请我看了好几次戏。那之后好像大家就有了电子邮件了,我和老叶交换了地址,自那起就是电子信息往来了。此后的二十几年间,我们有上百封E-mail,互通文坛信息,诗文往来,你唱我和,很开心。

2009年3月,我发电邮邀请老叶参加我的作品座谈会。是这样写的:

老叶你好!发去理论室拟的4月8日座谈会通知,请你来聚会,随便谈谈你的批评意见。

2008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出版了《艺术哲学读本》和《价值美学》,修订再版了《李渔美学思想研究》及《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我与钱克主编),平时很少有时间和、有机会听

黄山区新明乡樵山村,是个平均海拔500多米以上的地方。盘山路,围着密林转圈子。半天过去了,抬头一望,山壁里脊线还在平铺直叙,兴头仍涨着。扫尾的尖顶不见踪影。沟壑顺着陡坡快速滑落,溪流、霞光、时间掉下去了。见不到底的深渊里,几缕白云飘上来。杜鹃花红,蜂蝶在边上热闹着。余项、吕家、丁家、荷花坑等地,黑瓦白墙笋青豆黄,都是有色彩的村庄。流水雪白地挂在岩崖。炊烟升起了,柴草米面的香气飘上来。

1 在这草绿花红的季节,樵山村处处关门闭户。人上山了,都在茶棵里忙着。茶不等人,山峰斜下的阳光里,成长的颜色,是嫩黄、浅绿、墨绿的。这茶上午一个价,下午是另一个价。手指在叶片间飞舞,心思在坡度密集,人往高处走,目光向上望着。太阳和春光越来越温暖灿烂。

2018年,是个让樵山人难忘的年份。这一年人均收入21600元,全村脱贫。从2014年被列入省级贫困村,到整村出列,樵山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连伤残人余孝宽的三口之家也达到年收入二十多万元。余孝宽家曾是贫困户。那一年,他干活摔了跤,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因残致贫。系列苦果他尝了个遍。走路瘸着矮人一截,皱纹爬上额头,样子超过五十几岁的实际年龄。一个男人没腿怎么办?家里收入始终突破不了一万元。日子过得苦歪歪的。上门贩子,每斤香榧付农户80元。村书记汪卫国望着余孝宽,问,你家还有多少果子?结果剩下的部分,汪卫国全包了,每斤付给余孝宽100元。

多年来,山里的特产难得出去。油米酱醋盐,靠肩挑手提弄回来。2018年,区、乡、村合力打破交通瓶颈,争取项目资金160余万元,樵山公路实施全线安保工程。2019年国家投入1000万元,公路扩面延伸浇筑沥青。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奠平了基础。

这样的环境里,余孝宽由最初的8棵老香

我与叶廷芳的诗文情缘

□杜书瀛

取批评,现在请朋友们和同事们来座谈座谈,提提意见,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好事,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但是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吃几碗干饭。我不过是一块铺路石子。我是新时期文论和美学的一个普通的还算努力的参与者,顶多可以说:我尽力了,我没有偷懒。如此而已。将来某一天,这可以作为我的墓志铭:“一块铺路石子”。以此,足矣。做铺路石子,是我回报社会的方式。我只有这么大能力,也只能做这样的工作给社会以回报。1995年夏,我们六个朋友,邵燕祥、刘心武、何西来、钱克、白桦和我,在北戴河花了一个星期搞了个《北戴河对话录》。在对话时我曾经讲:一个人人下生来就先天地对这个社会欠债,因为社会为你的降生和之后的生活事先提供了并且还继续不断地提供着物质和精神资源、条件,因此你必须对社会“还债”或叫“报恩”。刘心武戏称这是基督教的“原罪”思想。

我辩称:“原罪”倒不是,但确实是“原债”——即先天地对你养你的社会欠债。既是“原债”,故应“还债”或“报恩”。我总认为,一个人能力虽有大小,但无论如何应该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说是对社会“还债”也行,说是对社会“报恩”也行。做铺路石子,就是我对社会“还债”或“报恩”。

老叶立即回复:“4月8日如无其他特别重要事情,我一定前往学习。”座谈会上,老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至今难忘。老叶完全同意我“原债”“还债”“报恩”的思想。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社会担当,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叫“还债”也行,叫“报恩”亦可。老叶一生,身体力行。他9岁时不慎跌伤,失去了左臂。他说:“如果不经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我就不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毅品格。”他立志超越正常人,不但不给社会增加负担,还要以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他当政协委员8年时间,提出了几十项关于国计民生的提案,而且有时是在尖锐争论中坚持正确主张,譬如有人要“复建圆明园”,他不但提案反对,而且在《人民日报》撰文(记住耻辱比怀念辉煌重要得多),坚决保护文物,记住耻辱。再如,他在十几年前就提案主张终止“独生子女”政策,实践证明他的远见卓识。在一个访谈节目中,他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华民族有过长期辉煌的过去,但是近代落后了,还挨了别人的打。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关注社会的进步,推动国家的复兴,为改革敢于发声、呼吁和呐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记者问他:“您在治学的同时也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请问您认为现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哪些有违人性的不合理现象有待解决?”老叶回答说:“一、大医院太拥挤,挂号须起大早,而且还得排长队,候诊也得等一两个小时。尽管我还是享受一定特权的——司局级待遇。二、银行是很赚钱的单位,但有的很牛的大银行不知为什么,营业点越来越少,去一趟至少得走20多分钟,而且每次都有几十号人在排队!为什么只顾自己多赚钱,不给客户减困难?三、大街上的自行车道普遍被不守规则的汽车霸占,迫使骑车者上人行道步行,有的带孩子的更是艰难与危险。四、中国的‘墙文化’是非常强大的,你看国家有万里长城,每个城市有城墙,每个单位有围墙,每个家庭有四合院,现在发展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防盗门,出租车里有防盗栏,现在更是连许多大街、广场都有防护栏,甚至某些人行道上也筑起了这类铁栅栏,成为首都北京一道奇特的景观!这完全是一种消极治安思维的产物,一种不是靠法规和自觉而是靠冷漠的器械来维护秩序的国民永远是散漫的草民!”

我与老叶是学者之间的君子之交,从物质层面说,真格是名副其实的“淡如水”——几十年来只有一次趁春节假期聚在一起吃一顿饭,而且是为了互赠自己的著作。平时,只是通过电子邮件谈文论诗。

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读《人·兽·鬼》,忆钱锺书先生二三事)后发表于《文艺争鸣》2021年4月号),发给老叶指正。老叶回复说:“谢谢大文欣赏。小的与钱先生杨先生亦有不少接触;与杨处同一‘菜园

班’。钱杨屈居7号楼时,小的下班时常顺便去看看他俩。钱百寿时,杨亲约我撰文纪念。这次无缘了,也写不出新内容了,憾甚!幸有仁兄出马,倍胜于老朽也!”我随即回复:“你与钱杨接触肯定比我多,可惜你写他们的文章我未得拜读,若有电子稿,能否发来?”老叶很快发来:“遵嘱发去关于钱的一篇(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原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1日,后收入《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杨的两篇(杨绛先生印象记)(原载《文汇报》1997年12月22日“笔会”栏,最后一段为1999年6月所加)、《走在人生边上的风景》(原载《新民晚报》2014年7月27日)。”我即刻拜读。感人肺腑,以至落泪。我说:“你发来关于钱先生杨先生的三篇文章,非常感人,好文章!因是公开发表的,书瀛未经你同意,就转给讨论家吴思敬共赏——这样好的文章不能独享。吴思敬非常赞赏你的文章。转去一阅。”吴思敬说:“转来的叶廷芳先生的三篇文章,泣血文字,非常感人,使我对钱、杨二先生的人格与学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把这三篇文章以及您昨天发过来的《读〈人·兽·鬼〉,忆钱锺书先生二三事》,做成一个文件夹,保存起来。谢谢您,谢谢叶廷芳先生!”老叶又给我发邮件说:“仁兄过奖了!老朽不善撰文,写点身边琐事而已。思敬亦为吾友也,过去匡汉住此,他常来,善诗,为人亦正。”叶

近年我心有所感时,再得慌,常常胡诌几句打油诗以疏解。2018年春节期间,我给老叶发了一个邮件:“老叶你好!春节即到,预祝全家春节好!今冬北京无雪,但春天例行来临,2月4日立春,胡诌小诗《立春即兴》,借以问候老朋友。”同时也把这首打油诗发给邵燕祥,庆祝春节好。

“你说今天立春好节气/终于熬过无雪的冬季/其实从见你那刻起/春天已住进我心里//白云朵朵从头顶飘飞/我看到的是簇簇白玫瑰//冷风嗖嗖吹过华北平原/我听到春姑娘拉动琴弦//杨树枝头的芽瓣在瑟瑟抖动/我看到春天把小手伸向天空//院子里的玉兰卷着鼓鼓的花芽/不几天它就举着春天尽情暴发//古人云“草色遥看近却无”/春姑娘藏在唐国的深处。”

2月8日,老叶发来一首“和”诗《迎春时节和书瀛》:纵使生命已进入冬季,你仍把春天拥在心里。难怪在你的字里行间,依然散发着春的暖意。

2018.2.8 叶廷芳

2月9日,我回老叶:“谢谢你的和诗。写得很好。我情不自禁转给邵燕祥看。他回信,并附打油诗数首。转给你。”邵燕祥的电邮是这样说的:“老杜,转来的廷芳兄诗亦拜读,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俨然。我近年偶有打油,现从2017年年头年尾戏作中各录五首供过目,不足为外人道也。今年以来无诗,以心情不佳,恐与天气无干,亦不足为外人道也。一笑!并请转老叶一看。燕祥致意。”

老叶即刻回复说:“咳,仁兄!怎么能把我那十分钟即兴涂鸦寄给燕祥兄呢!他可是真诗家呀,岂不让人见笑!?燕祥毕竟是燕祥,思想老辣,笔锋依然刚健。佩服!有诗兴不妨继续写下去!焉知成了个晚到的诗人!”

邵燕祥也回复我:“老杜:信悉。知你近来诗心萌动,我们写诗的队伍又扩大了,好!你写的春消息很动人,但我们这里还没感受到。立春已过,今天所谓立春,腊月二十三,小孩子已经没有什么祭灶的概念了。呵呵!预祝双安!燕祥拜。”

以上是我们三人的互动。觉得有趣,记了下来。燕祥的十首诗,非常好,但他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可能认为其中有些诗“不宜”公开,所以我不敢全都公之于世,但有一首,即写给沙叶新的,很有趣,不妨共赏:

遥寄沙叶新病中

日出天天日日新,忽忽沙兄“少十斤”;近来天地都多病,况是两间被卡人。被卡难阻善作剧,剧似人生生似戏;愿君续作连台本,落实骗子是真的。真成假处假成真,成群骗子闹纷纷;小骗装神又弄鬼,大骗俨然冠名神。有缘缘于有真爱,铁笔

要死,怕得要命。他们高举党的旗帜,不断扩大新四军影响。游击队由8个人2条半枪,发展到几百人。

那次兴尖岭战斗,刘奎跳下悬崖,村民戴金枝等人救了他。刘奎的腿肿得裤子脱不下,戴金枝用剪刀剪开裤子,帮着包扎伤口,抬着刘奎进了后山。第二天天没亮敌人来了。戴金枝的丈夫被枪杀。

樵山保卫战后,敌人把余家、项家两个村庄30多户烧了。敌人对清剿区内的居民按身份证配售粮、油、盐等必需品。生存越来越艰难。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队员们坚持上党课、文化课,甚至开展娱乐活动。用亲身经历,编歌唱着:“庙里头一战呀,打得真漂亮。三分钟消灭反共的武装呀,老百姓睁开眼笑呀,打开斗争新局面,政治影响到处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生动活泼的组织生活,让革命意志更为坚强。

刘奎不负党的重托,像樵山的映山红一样,不改本色。黄山游击队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力地配合了渡江战役,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表彰。知人善任,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做法。

乡党委书记焦振龙等一班人决定修复古战场,再现黄檀炮、礮石阵,将之建成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

车子在柏油路跑着。草木的飒飒声汇成阵阵涛涛,红花绿叶,险峰美景都在这里了。苍松翠柏掩映的樵山烈士纪念碑,台阶是83级,那是向人们诉说,樵山保卫战历经83天。台阶宽2.2米,寓意以查文松、项子林、项红梅等22名烈士为代表的先烈铺就的道路,指引后人走向美好的明天。



状写先生蔡;精神一代传一代,铮铮铁骨刷存在。犹记成都一执手,京沪千里相望久;闻间笑语声依稀,能令骗子绕墙走。”(沙叶新戏称其名一半即“少十斤”。)

我与老叶有时也以鲜花作为贺年礼物,2019年2月7日我给他发去我家盛开的鲜花照片,说:“老叶你好,新春快乐!附件是我家的两盆花,发去,再贺年!”他很高兴。他回复说:“毕竟是美学家,频频送来自创的美让我分享:日前是新撰的大作,今日是自栽的鲜花。时间真是飞快,不知不觉三天大年已过完!不知道我等还能过几个这样的大年!真是人生如梦啊!之所以生叹,是因为虚度了太多的年华!还有多少该读的书没有读,该做的事没有做!唉!”

2019年10月3日,在国庆假日的最后一天,我给老叶发去一首打油新诗《诗人的失落与追求》,最后几节说:

然而
诗远去
我心牵挂
我渴望着
新时代的诗魂
快快降临华夏
即使我
化为灰烬
化作烟霞
也会伴着
唐之情园
燕赵之河
以及我那
亭亭玉立的
灿烂光华
向着诗国
不懈地追求
不懈地攀登
我要将双手
死死抓住
诗魂的尾巴
假如
诗魂
是一团火
我愿愿
做一只
扑火的灯蛾
老叶回信说:“谢谢经常赠诗。更佩服你在一个没有了诗的时代还恋着诗!近年来死神不断迫击着我!住了5个月的院以后,昨天才出院。”我吃了一惊,即刻回复说:“老叶,不知你住院。一定要好好保重!祝一切好!”

对老友的病体,我只能以小诗当作精神药物给以安慰。2020年2月17日,我给老叶发邮件说:“我把以往的诗,集成一束,发去笑笑。里面附有与邵燕祥谈诗的通信,朋友们传看可以,勿与陌生人道。”

过了5天,2月22日,老叶回信说:“老兄勤奋,诗作不断,壮心不已!值得学习。人老了,还有那么多的诗兴!堪佩!老朽年来多病,无所作为!惨也!叶。”并赠了一首和诗《再赠书瀛兄》:

你的文论已立我心头,
而今诗笔又频频打油。
仁兄何须再羞羞答答?
任缪斯纵情为你伺候!
老叶有时也对我的打油诗提出中肯的批评。2020年9月,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大实话:你仍然光着腚》,里面提及一些文艺界乱象。老叶批评说:“此诗不应联系芸芸众生!”又说:“任彦芳写过此题材,那是霹雳,是雷电!你提及的那位歌星是香港人士吧?曾寄过好多本诗文给我,还在一个集会上见过。对此等人用不着皇帝的更衣这样重大的题材去对付她。”

以往的电邮很频繁,互相回复也很及时;但今年以来,他的电邮少了,5月28日我给他发问候,他隔了两天,到30日(那是个星期天)晚上9点零2分才回我:“我离阎王爷只有几步之遥!永别了,朋友!”当时我懵了,怎么忽然如此?我赶紧回信安慰他。没有想到,他是提前与我告别——从此再无电邮和其他音讯给我,直到国庆期间得知他离世的噩耗。

(上接第5版)

我认为,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应该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首先,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他所批判的“自大”的爱国主义,而是清醒、真诚的爱国主义。他曾经说过“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但这不代表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恰恰相反,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正体现在其深刻的批判与期望之中。他说“不啻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给予国民性以最尖锐的揭露,也是因为鲁迅对于中国的未来寄予了真诚的期待,并且相信中国人经得起这样的自我反思。可以说,没有鲁迅式的“睁了眼看”,再激烈的爱国情感也会陷入盲目与失落。

其次,鲁迅的爱国主义建立在坚定的个人意志与勇气之上。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就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血气方刚的诗句;十余年后,鲁迅在《新青年》上探讨爱国主义时,依然赞美异个人与多数庸众战斗到底的意志;甚至在《野草》中,反映着鲁迅内心彷徨与挣扎的“过客”依然本能地说出了“我只得走”。鲁迅式的坚强意志是其“立人”主张最直接体现,是现代中国无数爱国志士最鲜明的底色。140年过去了,中国早已不似从前那般“风雨如磐”“寒凝大地”,但鲁迅锐利无比的勇气与韧性具有永恒的感召力量。

最后我想补充的是,对于今日的中国青年而言,呈现在眼前的“鲁迅”形象是多样且复杂的。我们知道鲁迅是伟大的启蒙者,但是也知道鲁迅深刻地超越了精英—庸众的启蒙结构;我们知道鲁迅在坚定地拯救中国百姓而奔走,但是也知道他有时会感到“梦醒了无路可走”;我们知道鲁迅大胆地剖析国民性,但是也知道他在深刻地拷问自己的灵魂,以至于要“反抗绝望”。但我认为,正是鲁迅的复杂与深刻才体现出鲁迅先生爱国之深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仍然是我们理解鲁迅所最深入的一个面向。鲁迅的爱国主义是清醒深刻的,是坚定勇敢的,也是伟大深沉的。

作为肩负重大使命与责任的青年一代,我们应该从鲁迅那里寻找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看得见“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看得见自己生活世界之外广阔的天地。在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愿全体青年共勉!